

# 转型

# 大 A Great

# Transformation

The Past, Present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Reform

张军 王永钦 / 主编

## 中国经济改革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

深层解构改革开放历程 巨变时代探索中国未来  
讲述中国经验 | 剖析中国战略 | 贡献中国智慧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外借



# 大 A Great Transformation 转型

The Past, Present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Reform

中国经济改革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

张军 王永钦 /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张军,  
王永钦主编.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32-2938-9

I. ①大…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6701 号

责任编辑 郑竹青 钱 敏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 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张军 王永钦 主编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6.5

插 页 3

字 数 624,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938-9/F·1171

定 价 118.00 元

# 序

## 中国做对了什么？

张军 王永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过，一旦你开始考虑经济增长问题，你就很难去想其他的问题了。的确，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破译经济发展的密码；无数的仁人志士也正在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同样，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一旦我们开始考虑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也很难去想别的问题了。

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走过了四十度春秋。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在经济方面，中国从世界最落后和封闭的国家之一，跃升为一个 GDP 居世界第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而纵观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真正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实际上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经济反而陷入了某种“发展陷阱”：要么是“贫困陷阱”（如非洲国家和地区），要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亚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智慧和理论素材。张五常曾经说过，对于中国的发展，最应该问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做对了什么。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此时系统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义不容辞。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就和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一种代表性

的方案是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提出来的，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有四个支柱，一是“私有化”，即界定私有产权；二是“市场化”，即让市场发挥作用，将“价格做对”（getting prices right）；三是“稳定化”，即控制财政赤字和避免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即减少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干预。这四个支柱看上去都非常合理。但今天尘埃基本落定，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苏东（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其中有些国家至今尚未恢复元气。而选择另一条道路的中国，却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过去40年中国在经历漫长经济停滞后的重新崛起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正在继续影响着新世纪的历史进程。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探索和转型远远早于苏联和东欧国家。40年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历史使命：彼岸何在？如何到达彼岸？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长期贯穿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计划经济是二战后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但在中国和苏联都经历了失败；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尽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此之前就开始了。

尽管在理论上，现代经济学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此岸”和“彼岸”：在计划经济中，没有市场和价格机制，经济的组织是按照计划来协调；而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下，所有的市场（包括各种产品的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是完备的，只需价格机制便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政府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品。但没有一个现成的理论告诉中国人，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

在我们看来，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两个本质的区别。第一，与市场完备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转型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往往是缺失的，或者即使不是缺失的，往往也是高度不完美的。第二，从技术水平来说，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往往远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前沿。市场缺失意味着存在帕累托改进和政府干预的潜在可能性；远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前沿意味着它们可以学习或者模仿现成的技术，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新和研发活动来创造新的技术，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资源、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发展。这与早期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提出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和相应的经济组织方式应该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思想也遥相呼应。

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下，与苏联及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独辟蹊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策略和治理结构。

第一，在整体的改革战略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中国采取的这种实验式的改革方法是务实和行之有效的，因为如前所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现成的规律可循，这种试错式的改革也符合科学发现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和民众发现转型路径、发现市场、发现新世界和新生活的一个过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部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在极大地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为1984年起的城市部门的改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为农业发展为城市部门的改革提供了生活必需品、投入品、劳动力和市场；同时农村的改革也可能是政治上最容易推进的。

而当价格“双轨制”被作为一种价格改革的思想与方法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被提出时，中国在80年代初以来就在工业生产部门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个双轨的体制贯穿了整个80年代，并几乎延续到了90年代上半期。这种帕累托式改革的双轨制总体上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共十四大之后，市场化改革在90年代中期后得到全面推进，尤其是财税、金融这两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第二，中国转型迄今为止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结构密不可分。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是在整体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它们的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分不开。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在这个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做对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

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尤其是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中国的 M 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来配置）使得经济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地区之间基于 GDP 的单维度的标尺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的 U 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条条”来配置），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收益。这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解决了政治体系内部经济发展的激励问题，根据经济学中著名的蒂布特（Tibout）模型，相当于创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品竞争市场，解决了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事实的确如此，过去 40 年中，地方政府在发展基础设施、市场化、民营化和城市化方面功不可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4 年之后，地方政府推进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中国经济才开始真正起飞。目前，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也许这正是张五常称其为“最好（妙）的制度”的原因。

第三，中国的转型迄今为止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社会治理结构密不可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这种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之间基于 GDP 的单任务锦标赛（single-task tournament）解决了中国公共品的市场失灵问题；在私人合约和治理方面，基于重复博弈的自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则缓解了市场缺失和中国部分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这种关系型合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型合约，在市场不完全的赶超型经济体（如德国和东亚模式下的经济体）中，在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型的合约（在东亚模式中表现为“产业政策”）。它作为一种次优（约束下的最优）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市场的不完全，促进经济发展。早期的乡镇企业到后来的各种政企纽带都是这种关系型合约的表现。

第二个层次的关系型合约发生在不同的微观主体之间（如企业与企业之间），近年出现了新的文献来研究中国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基础。这些研究发现，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对于缓解信贷约束、分担风险、分享信息，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一种次优的制度，促进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这些基于关系型合约的治理由于不需要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特别适合市场范围较小、相关市场缺失的情况。而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网络关系为这种非正式制度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第四，在具体的发展策略上，中国采取了扭曲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的政策。市场不完全、尤其金融市场不完全意味着，仅仅依赖市场无法实现经济中有效的资本

和投资均衡。而政府压低工资和其他要素的价格，也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压低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城市政府压低工业用地地价等，促进了企业的资本积累。最近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和追赶的发展阶段，这种策略是给定约束条件（尤其是金融不完全这个约束）下最优的发展策略。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结构特别有助于实施这种发展策略。

有意思的是，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的策略和治理结构暗合着经济中的次优理论。次优理论指的是，如果经济中存在很多扭曲，那么消除其中的一个扭曲或者几个扭曲（只要还没有消除所有的扭曲），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举个形象的例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同时水龙头也坏了，关不上，一直在流水。此时如果试图将水龙头修好关上，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对于一个经济体，特别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亦是如此。由于经济中存在很多扭曲，很多市场都是不完美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增加一个扭曲，反而可能会促进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正如前文所述的，在金融市场不完全之时扭曲劳动力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发展中可以举出很多。对于中国的问题，如果仅仅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中国的发展模式似乎暗含了一般均衡下的“次优理论”的逻辑。

第五，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与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密不可分。我们前边提到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两个结构性特征是：市场不完全与技术水平远离世界前沿。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和基于关系型合约的私人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失的市场；而远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前沿则意味着中国可以学习或者模仿现有的技术，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新和研发活动来创造新的技术，进而意味着在这个基于投资（investment-based）的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动员资源来发展经济，而非自己去从事研发。也就是说，在这种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经济体系内的资源。在这个阶段，由于市场的缺失和不完美，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无法达成帕累托有效的配置，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改进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而中国独特的治理结构尤其适合这种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融入全球化，相当于为这种发展模式插上了翅膀，使中国可以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中实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深刻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



根据我们对东亚模式的研究，政府干预的作用依赖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成功的政府干预需要满足几个必要条件（未必是充分条件）：一是，政府的目标函数应该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即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二是，政府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和政策工具来实施必要的干预；三是，政府政策干预的形式和幅度应该取决于经济体具体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完备程度与距离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有所调整。尤其是，在市场发育足够充分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治理结构也要进行适时的转型。在一个阶段被证明是成功的体制和政策，在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经济发展的桎梏和障碍。

在过去40年中，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政府应该适时加以调整，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离世界的技术前沿越来越近，从发展阶段上来说，已经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为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动员和组织投资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早期促进投资的政策（如压低工资）会阻碍技术创新。在新的历史阶段，正如哈耶克很久之前就论证过的那样，更加分散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会更好地加总大众的智慧，促进基于创新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众的智慧如果充分发挥出来，其力量会是惊人的。

其次，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其他方面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如压低工资和降低资本成本的发展策略，加上其他一些扭曲政策，造成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加强版的东亚模式。中国组织和动员资本的能力远远超过当时的东亚模式，尤其是，中国政府控制着土地。这也造成了中国和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东亚模式下的经济体在经济起飞前，对土地市场进行了平等主义的改革，这种起点的公平有助于东亚模式实现共享式增长。如果我们将目光再放得更远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北美洲和南美洲经济发展路径的分野也是由于初始要素禀赋的不平等造成的。北美洲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的初始分布比较平等（以自耕农为主），这使得人们有积极性来投资人力资本；南美洲则刚好相反，土地要素的分布高度不平等（庄园制），这使得没有土地禀赋的群体在社会中的议价能力较低，缺乏投资人力资本的激励，经济没有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

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长期以来，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最新经济研究也表明，在经济追赶阶段完成之后，“亲商的”（pro-business）发展战略应该适时转变为“亲劳工的”（pro-worker）发展战略，由于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有助于经济顺利地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这种转变也是中国的社会改革政策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再次，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近的一些经济学研究表明，中国这种“将价格做错”的发展策略，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便宜和丰富的产品，改进了消费者的福利，但也给世界很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当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了。

最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在巨大的外部需求缩减的负面冲击下，中国的GDP增速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中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方案，这种刺激方案以银行贷款的方式进入了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些部门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同时，过去十多年影子银行的发展也加剧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问题。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12年中国的GDP增速从两位数步入个位数，这一年中国的利息支付总额也正好超出了名义GDP的增量，这意味着中国在宏观经济层面已经出现了债务积压问题。经济增速下降与债务积压两者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是中国经济短期内要面临的挑战，中国要避免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可能也与近年来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中淡化GDP指标有关。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也是中国的政治治理面临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从中长期角度而言，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战略和相应的治理结构，可以解释中国迄今为止的成功，同时也蕴含了中国未来改革的空间和路径。随着中国经济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学习和模仿的潜力越来越有限，中国正面临着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向创新的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同时，随着市场的越来越完备，前期最优的治理结构和发展策略需要相应的调整，中国也面临着从“将价格做错”转变到“将价格做对”（尤其是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价格）的关键历史时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济转型和发展是一个从“此岸”（市场不完备、生产率低、人均收入低）到“彼岸”（市场完备、生产率高、人均收入高）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和艰巨的历史任务。过去的40年中，甚至是过去的一百年

中，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和人民大众为此流血流汗、思考践行，使得如今中国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此岸已远，如何到达彼岸？本书荟集了我们对于中国40年经济改革的思考和展望，从多个角度来反思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剖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当下，并展望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我们将此书献给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是为序。

# 目录 Contents

- 第 1 章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农业:成就与挑战 001
- 第 2 章 中国城市化 40 年:增长、集聚和不均衡 030
- 第 3 章 改革开放中的户籍制度:历史、当下与未来 052
- 第 4 章 “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081
- 第 5 章 产权保护视角下的官商关系和民营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启示 103
- 第 6 章 改革年代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 128
- 第 7 章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事实与成因 160
- 第 8 章 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中国金融体系:回顾、现状、风险与展望 203
- 第 9 章 像中国那样出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40 年回顾 248
- 第 10 章 改革开放 40 年:从利用外资到资本“走出去” 278
- 第 11 章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步骤、问题和政策建议 360
- 第 12 章 从平等地贫困到不均地繁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贫困—增长—不均等三角关系 403
- 第 13 章 改革开放中的税收制度改革:进程、成就、问题与展望 420
- 第 14 章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就、问题与展望 469
- 第 15 章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发展 40 周年回顾、思考与展望 494
- 第 16 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保护历程与经济转型 526
- 第 17 章 中国经济展望:潜在增长率估计与结构转型 547

# 第 1 章

##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农业：成就与挑战

汤 昕 |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奚锡灿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徐灏龙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为人类活动提供必需的食物和营养，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部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也扮演了特殊的重要角色。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开始，农业部门产量和生产率在这 40 年中稳步提高，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还大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福利。与此同时，农业改革将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由此释放的劳动力红利，为我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动能。

我国农业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的历程，是一段不断清除制度障碍、顺应要素流动从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也是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相互激发、正向循环的过程。这些制度障碍既包括农业部门内部的要素流动障碍，也包括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障碍。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以清除制度障碍为中心的发展经济学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农业问题。当前我国农业所面临的高投入、高产出、高库存、高进口和高污染的困局，其根本症结正在于农村土地和劳动等核心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同时，在城市内部，农村移民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从而在进城务工之初，他们就已形成了迟早要回乡的预期。而土地作为农村居民最重要的社会保障，这一预期进一步阻碍了土地的流转，并进一步阻碍了农均耕地面积的扩张。因此，在改革开放 40 年之后，小农式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主流，而规模经营一直无法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肯定

农业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上述“五高”困局并未消失，它正是下一步的改革的目标。

## 1.1 中国农业的改革历程和伟大成就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而拉开大幕。由此开始，我国农业逐步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桎梏。虽经历曲折反复，但市场机制逐步成为主导农业生产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基础。虽然农民的经营规模仍然受到土地和户籍制度的严重限制，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的范围内，农民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决策主体，可自行决定“种什么、怎么种”，从而大大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国内市场上，私营农产品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国家购销体系逐步被削弱，而农产品交易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放松，市场整合程度不断加强；在国际市场上，随着我国加入WTO主导下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政府削减了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促使国内农产品价格趋向国际价格，促进了国内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黄季焜，2010）。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各项制度逐渐放松。1984年，中央四号文件提出了“开创乡镇企业新局面的历史任务”。从此，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初期“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最大收获”（邓小平语），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2014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就业人员已达到1.5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户籍制度也有所松动，国家开始放宽农民进城务工的条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从此，大量农民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非农部门工作。21世纪初加入WTO之后，我国进一步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东部沿海地区非农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在这一大背景下，政府取消和清理了许多对于农民跨区流动和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例如，2003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限制。同年，我国终止了对农民工的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到2014年，农村户籍进城人员数量已经达到2.3亿。同时，在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过程也将许多农村劳动力就地城镇化。

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和结构转型过程，在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转移了大量劳动力到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动能。非农部门经过快速发展，以更低的相对价格向农业部门提供农机、化肥和电力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两部门形成了正向循环。

### 1.1.1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从1980年开始，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和制度障碍的削弱，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出现了高速持续的增长。图1.1描述了1980—2014年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就业人员的农业产值）的变化。其中，农业就业人员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而农业产值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农业产值指数。从1980年到2014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7.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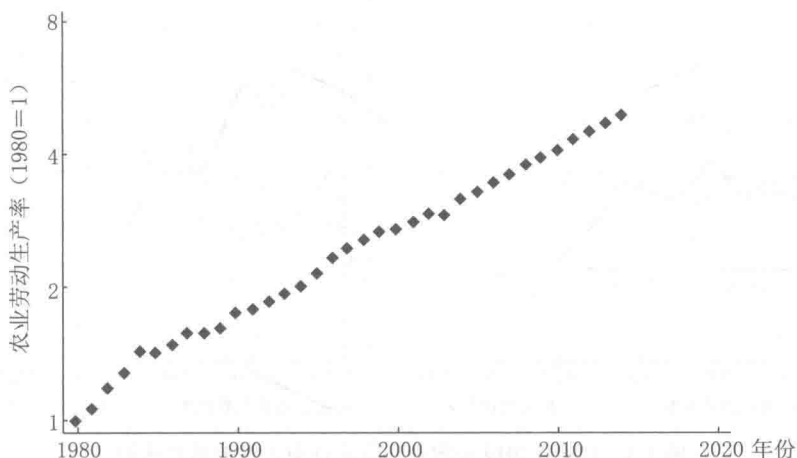


图 1.1 1980—2014 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农业就业人员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而农业产值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农业产值指数。

根据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定义，若观察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么这种增长可能来自农业产值的增加，也可能来自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为了区分这两种变化，我们在图1.2中刻画了1980—2014年间我国农业产值（控制价格因素）的变化，在图1.3中刻画了1980—2014年之间农业和非农就业人数和比例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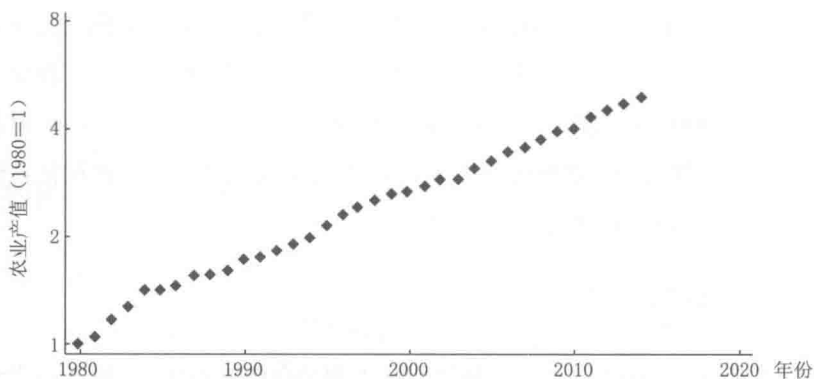


图 1.2 1980—2014 年我国农业产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并根据农业产值指数重新标准化（1980 年数值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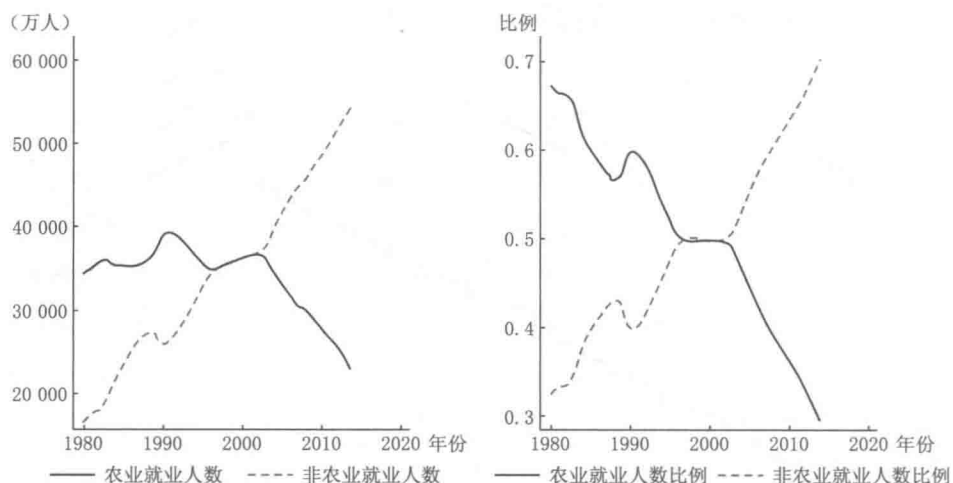


图 1.3 1980—2014 年农业和非农就业人数与相对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 1980—2014 年，我国农业产值稳步上升，共提高了 4.9 倍；另一方面，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不断降低，从 1980 年的 67% 下降到 2014 年的 29%，农业就业人数绝对值从 1990 年开始也不断下降，从接近 3.5 亿下降到不足 2.2 亿。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

同时我们看到，在不同历史阶段，因为改革的侧重点不同，这两种变化对于农业



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不一样,也间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出现波动。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行之初,由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大大激发,农业产值实现快速增长。由图 1.2 可知,1980—1984 年我国农业产值的增速明显快于其他年份。虽然农业就业人数并未下降,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高速增长:1980—1985 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 7.0%,超过 1980—2014 年的平均数 6.1%。在 1985 年之后,农业产值保持平稳增长,虽然乡镇企业吸纳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就业人数相对于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在下降,但由于人口和就业总人数的增加,农业就业人数绝对值反而有所上升,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有所放缓。

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大量农民转入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农部门就业,农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虽然农业产值仍然保持平稳增长,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由于农业就业人数的下降而重新提速。在我国加入 WTO 后,贸易部门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更是大大刺激了其从农业到非农部门的转移。在 2002—2014 年,我国的农业就业人数从 3 亿下降到不足 2.2 亿,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 8.6%,远超 1980—2014 年整个时间段的年均增长率 6.1%。

以下进一步的分析将表明,我国农业产值的稳步增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农业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稳步增加;其次,农产品结构得以改善,经济价值较高的非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快速上升。

图 1.4—图 1.6 分别描绘了我国 8 种主要农作物的总产量、单位产量和播种面积。由图 1.4 可知,除了麻类作物以外,其他主要农作物的总产量均大幅增加。其中,粮食作物(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作物)产量稳定增长,2014 年相对于 1980 年增加了 87%,从而保证了我国能以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0% 的人口。由图 1.5 可知,1980—2014 年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并无明显变化。因此,粮食产量的增加完全来自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

除此之外,非粮食作物(麻类作物除外)的产量增加则大大超过了粮食作物,从而改善了我国的农作物结构。其中,棉花产量在 1980—2014 年间增长了 128%,已是增速最慢的;而增速最快的水果产量则增长了 2 330%。从图 1.5 和图 1.6 还可以看出,非粮食作物的产量增长,既来自单位面积的增长,也来自播种面积的增长。